

“你怎么被捕的?”

“是叛徒出卖。”

“你叛变了没有?说!”

“我的历史党都审查过，早有结论。”

“需不需要念一份材料给你听听?”

老家伙开始有些紧张眼囊下松弛的皮肉抽搐了两下。

“当今反共战乱救国之际，本人丧失警觉，交友不慎，误入歧途，这话还记不记得?”

“我记不得说过!”老头矢口否认，鼻尖两侧冒汗。

“这才念了几句，刚开个头，提示一下，还用念下去吗?”

“实在想不起来，都几十年前的事了。”老头口气已软，突出的喉结上下一动，咽了口唾液。

他拿起桌上的材料晃了晃，在扮演一个讨厌的角色，但是与其由人审判不如先充当审判者。

“这是一个抄件，原件还有签字画押，盖的手印，当然是你当年的名字，弄得都改名换姓，这恐怕很难忘得了吧?”

老头不吭气了。

“还可以再念几句，帮助你回忆回忆，”他继续念道，“恳求政府从宽开释，立据保证，再有媚共亲匪的形迹可疑人等，随时举报。这算不算判变?你知不知道地下党对叛徒是怎样处置的?”他问。

“知道，知道，”老头连连点头。

“那你呢?”

“我没有出卖过人……”那光秃的额头渗出汗珠。

“问你呢，你这是不是判变?”他问。

“站起来!”

“站起来说!”

“老实交待!”

在场的几位造反派哥们纷纷喝道。

“我……我是交保释放的……”老头站起来了，哆哆嗦嗦，声音在喉管里刚能听得见。

“没问你怎么出来的，不自首能让你出来吗?说!你这是不是判变?”

“可是我……后来还是恢复了同党的联系——”

“那是当时地下党并不知道你已经自首了。”他打断了。

“党原谅，宽恕了我……”老头低下头来。

“你宽恕了吗?你整人的时候那么狠，你整群众的时候暴跳如雷，人写了检查你还不放过!”

反映示你下属的支部，说把材料钉死，不能让他们再翻过来，这话你说过没有？”

“说！说过没有？”又有人大声喝道。

“说过，说过，我有错误。”这同判党相比都是小问题，老头连忙承认。

“岂止是错误？说得好轻松！你逼得人跳楼自杀！”有人拍桌子了。

“那……不是我，是执行上的问题——”

“正是你的指示，你亲自指示，要把历史问题同现实表现联系起来，追查清楚，说没说过？”这哥们还揪住不放。

“说过，说过，”老头乖巧了。

“谁反党？判党的正是你！把这统统写下来！”这哥们又厉声喝道。

“怎么写？”老头问，一副可怜相。

“这也需要秘书？”另一哥们嘲弄道。

有人笑了，众人七嘴八舌，像逮到了一条大鱼，兴奋得不行。老头稍稍抬起头，面色发青，邈邈的下唇煞白，颤禁禁说：

“我……我有心脏病……可不可以喝口水？”

他推过去桌上的一杯凉水，老头从衣袋里掏出个小药瓶，手颤颤的倒出一颗药片，喝了口水，吞下了。

这老家伙年纪比他父亲大得多，他想别当场心脏病发作弄出人命，便说：

“坐下，把水喝完，不行的话，可以在沙发上躺下。”

老头不敢朝坐了人的沙发那边去，可怜巴巴望着他。他一转念，作了个决定：“听着，明天一早交份自首判党经验的详细材料来，怎么被捕的，怎么出狱的，证明人是谁？在狱中又作了哪些交代，统统写清楚。”

“嘿，嘿。”老家伙连忙弯腰点头。

“你可以走了。”

老头一出门，正在兴头上的哥们便都冲他来了。

“有这么份材料他还跑得了？无产阶级专政天网恢恢！别让这老东西心肌梗死在大家面前。”他油嘴滑舌，也一样恶毒。

“他要回去自杀了呢？”有人问。

“量他还没这勇气，要不怕死，当年也就不会自首。明儿准把认罪书交出来，你们信不信？”

说得众哥们哑口无言。他由衷讨厌开口闭口都是党的这老家伙，所以动了恻隐之心，也是在他泯灭了对革命的迷信，了结了那纯净无瑕的新人和那堂而皇之的革命制造出来的神话之后。老家伙隐瞒了自首的事，把以前的笔名当成真名用，躲过历次审查，这许多年过得想必也心惊胆战，他想。

不可以改变信仰，上了党的这条船就得一辈子跟到底？就不可以不做党的臣民？要就没有信仰呢？就跳出这非此即彼的硬性选择，你就没有主义，还能不能苟活？你母亲把你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主义，你这个注定败落的家族的末代子弟就不能活在主义之外？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当革命的打手就得为革命受难？你要不为革命而死，还有没有权利茗活？又怎样才能逃得出

出这革命的阴影？

阿门，你这生来就有罪之人，也当不了法官，不过以玩世而自卫，混同在造反派队伍里。你此时越益明确，也是找个栖身之地，藉调查党的干部为名，开了一叠子盖上公章的介绍信，领一笔出差费，到处游荡，不妨藉此见识见识这莫名其妙的世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这铺天盖地的革命。

黄河南岸的济南城里，他在一条老街找到了个小作坊，要调查的对象是一名劳改释放犯。管事的一位中年妇女腕子上带的一支袖套，在糊纸盒子，回答说：“这人早不在了。”

“死了？”他说。

“不在可不就是死了。”

“怎么死的？”

“问他家里人去！”

“他家还在？有谁？”

“你到底调查哪一个？”这女人反问他。

他无法向街道作坊的一个女工说明这死人同要调查的干部当年是大学同班同学，一起参加过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尔后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以及如此这般铮铮如铁的革命逻辑，也无需费口舌，作这许多解释，可总得弄个人死的凭证，好报销出差的路费。

“能不能盖个戳子？”他问。

“什么戳子？”

“写个人死了的证明呀？”

“这得到公安局派出所去，俺们不出这死人的证明。”

“得，去黄河咋个走法？”他学这女人的山东腔，问道。

“啥个黄河？”这女人问。

“黄河，俺中国就一条黄河，你们这济南城不就在黄河边？”

“说啥呢！那有啥个好瞅的？俺没去过。”

这女人刷起浆糊，糊她的纸盒子，不再理会他了。

常言道，不到黄河心不死，他突然想起看黄河。自古歌咏的这黄河他虽然多次经过，总在火车上，从大桥一闪一闪的钢铁框架中看不出这河的伟大。在街上他问到个路人，告诉他黄河还远，得乘汽车去洛口镇，再步行一段路，上了大堤才能见到。

等他上光秃秃高高的黄土大堤，没一点绿色，对岸黄土扑扑的泛区没有村舍，也不见一棵树木，不同的水位泥沙淤集形成的断层和斜坡下滚滚泥浆，河床高悬在市镇之上，这湍急的近乎棕红的泥江难道就是千古传颂的黄河？这古老的中华文明就此发源？

天际下，泥江漫漫望不到头，泛着点点耀眼的阳光。要不是远处太阳下还有一只帆船的黑影浮动，简直没有一线生机，黄河的歌颂者真来过河边？还是信口胡编？

高天远影，一支木桅杆的帆船顺流颠簸而来，灰白的风帆上大块大块的补丁，一个赤膊的汉子掌舵，还有个穿灰布褂子的女人在船舷上捨落什么，舱底堆的半船高的石块，也是用来防备汛期哪里的堤岸决口吧？

他下到河滩，越来越稀湿的淤泥，脱下鞋袜，提在手里，赤脚踩在滑溜细腻的泥沙中，弯腰把手伸进河水里，抽回一手臂的稀泥浆，太阳下便结成一层泥壳。“喝一口黄河的水”，某位革命诗人曾经这样咏唱过，可这泥汤别说人喝，连鱼虾怕也难活。赤贫与灾难原来也是可以歌颂的。这条近乎死了的巨大的泥水流令他惊讶，心中一片荒凉。多少年之后，一位中央要员说要在黄河上游竖立座民族魂的巨大雕像，想必也已经竖立在那里了。

火车在长江北岸的一个小站夜里临时停车，人关在闷热不堪的车箱里，车顶上电风扇嗡嗡直转，发馊的汗味更让人难以喘气。一停几个小时，广播里解释说，前方站发生武斗，轨道上堆满了石头，什么时候通车还不知道。车里的人围住乘务员抗议，车门这才打开，人都下了车。他去稻田边的水塘里洗了洗，然后躺在田埂上，看满天的星，抱怨的人声也平息了，一片蛙鸣，瞌睡来了。他想起小时候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乘凉，也这么望过夜空，那童年的记忆比天上明亮的启明星更遥远。